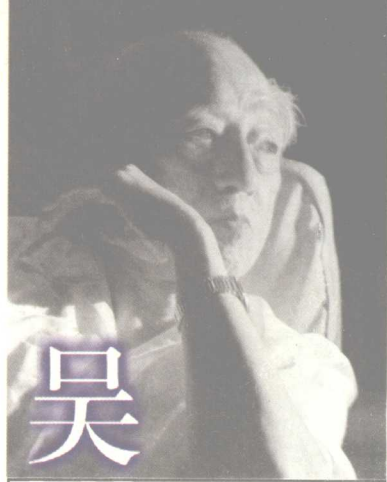




吴小如

古文精讀舉隅

• WUXIAORU ZHU •
GU WEN JING DU JU YU

我认为：古今名篇佳作实在是太多了，并非任何一篇作品都能写出鉴赏文字来。只有原作精彩，有可鉴赏的内容和价值，才有可能写出可鉴赏的文字。后者不过是附丽于原作的副产品。

—— 著者

H194.1
106

吴小如 著

古文精讀舉隅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文精读举隅/吴小如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5(重印)

ISBN 7-80504-838-X

I. 古... II. 吴... III. 古典散文—文学研究—中
国 IV. 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8178 号

古文精读举隅

吴小如/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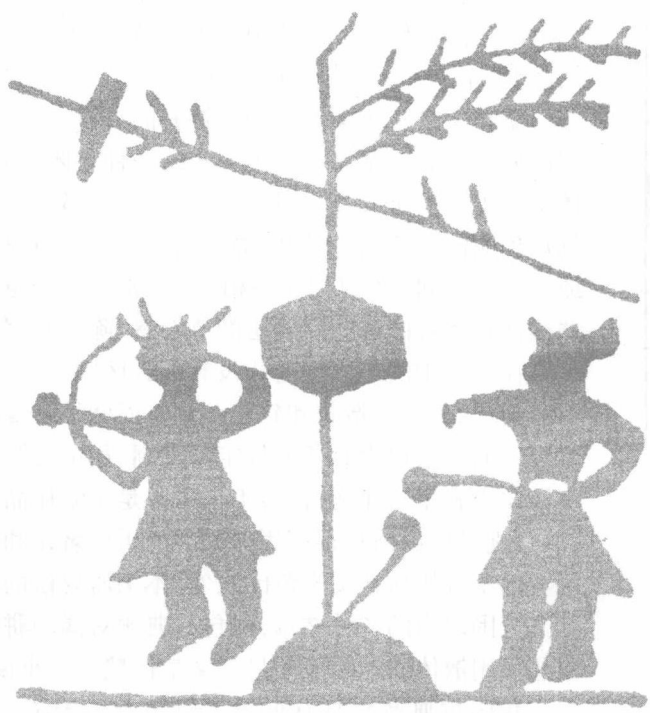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327000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1—6000

ISBN7-80504-838-X

1·183 定价:28.00 元



代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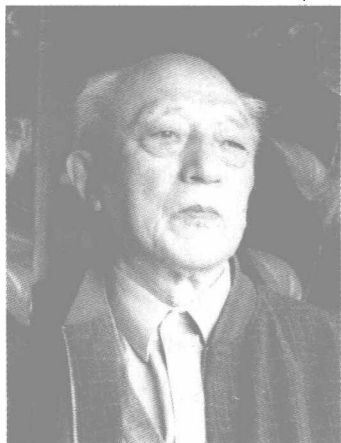
DAIXU

古典散文发展述略

在我国古典文学的领域中，所谓“散文”，应具有广、狭两义。就其广义说，散文是对韵文而言的一种文体。就其狭义说，则指包括在散文这一文体中的与骈体文（又称骈文、四六文）相对而言的散体文。论述中国古典散文（不仅指散体文）的发展演变，不宜排斥骈体文的情况不谈。

骈体文是我国文学中一种特有的东西，它是以对仗很工整的四字句和六字句为基本句式的一种文体（当然，在一篇骈体文中也会夹杂着互相对仗的三、五、七字句），讲究用典故和绚烂华丽的辞藻，着重铺陈描绘。在每一联对仗得很工整的四或六字句之间，不仅词义要相对，词汇的声调也要平仄相对，并须注意字音的谐调和句法的节奏感。除了句尾不押韵外，几乎同律诗的中间四句的写法没有什么区别。而一般用散体文写的文章，其遣辞造句和句法结构方面就不需要这些考究，文章每句的字数更没有任何规定和限制。用散文写的东西（包括用散体文和用骈体文写的）不一定是文学作品，但在我国古代（特别是唐以前），很多用散文写的历史著作和哲学著作，实际上都不宜排斥在文学范围之外。本书所要谈的，是指广义的散文范围以内的各种文章，也包括典丽对偶的骈体文在内，但不包括用散体文句写成的另一文学体裁——小说。

我国古典散文具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传统，内容相当丰富。它的发展演变大体经过以下几个阶段：先秦的历史散文和



诸子散文奠定了古典散文发展的基础；西汉司马迁的《史记》给史传文学开创了新局面；从东汉到盛唐，骈体文垄断文坛数百年；经中唐和北宋两次“古文运动”之后，散文体又得到很大发展；明清两代，由于复古主义和八股文的影响，散文始终没有跳出形式主义的窠臼；直到近代，在那些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受到资本主义文化思潮洗礼以后，散文才进入一个新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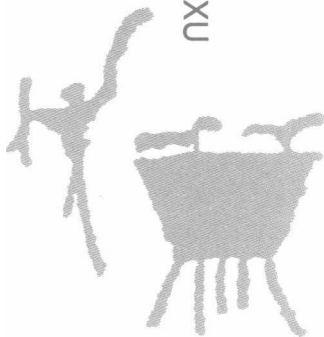
这里只就古典散文发展的几个阶段作简单扼要的介绍。

一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确凿的科学依据足以说明中国的散文究竟始于何时。但从地下发掘的文物资料来看，远在殷商时代（约公元前1766—1122），就已经有了数量相当大而结构比较严密的文字（即所谓方块汉字）和篇幅简短、修辞精练的书面语言。我国的文字是为了适应汉语的特色而产生的。汉语的特点是一音表一义，即基本上以单音缀的词汇为语言的最小单位，因此我国的汉字也就形成了一字表一音的方块字而非拼音文字。这种文字翻转过来又对语言起制约的作用，特别是使书面语言

代序/

DAIX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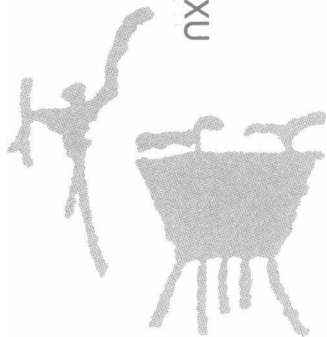
趋于精练简短。殷代是奴隶社会，贵族统治阶级非常迷信神权，他们的一切企图和行动，事先都须取决于占卜。而占卜的结果，就用简短的文句镌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卜辞”，而称用来表达卜辞内容的文字为“甲骨文”（这个“文”是文字的意思）。在卜辞里往往发现首尾具备、言简意赅的短文，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散文。殷周时代，贵族统治者利用青铜制成各种祭器、食器和兵器，上面大都铸着或刻着简短文句，我们通称为“铜器铭文”，而称这种用来表达铭文内容的文字为“吉金文”或“金文”（这个“文”也是文字的意思）。西周时代的铜器铭文有的长达三五百字，内容或记战功，或述祖德，还有涉及讼事判断的。卜辞和铜器铭文虽非文学作品，但它们所具有的简明洗炼的特点却对后世散文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个特点一方面为汉语、汉字的特点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受到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因为龟甲、兽骨或铜器的面积既不大，刻字或铸字又很困难，当然不宜把文句写得太长，篇幅搞得太大。不过从当时已经达到的生产和文化水平来估计，殷商时代在卜辞、铭文之外已有用散文体裁撰写的书籍。这从周代的历史记载也可以得到证明。这种书籍即所谓“典”、“册”，乃是把文字刻在竹简、木片上，然后用绳子或熟皮把若干简、片编系起来而成的；其质量的笨重和数量的受限制，初不下于甲骨和铜器。因此，尽管内容很多，文章的字数却不得不尽量减少，在修辞方面也必须尽量做到用最精确的词汇表达出最允洽的文义。这样，我国古典散文的短小精悍、简明洗炼的传统特色就开始形成了。由于竹木不易保存，殷周时代“典”、“册”之类的实物早已湮损不传（现在出土文物资料中不乏先秦古籍，但都

是秦汉以后写或刻在竹木简上的),保存在由周代人所编辑的诏令文告结集《尚书》里面的殷代文告,只有寥寥几篇,恐怕也已经过周代史官的修订润色了。

无论西周时代还是奴隶社会,作为最高奴隶主的周天子,威权是相当高的。当时享受文化教育特权的当然只能是贵族统治阶级,学术中心乃在“王官”^①。在这种情况下和条件下,文字的使用范围主要在于记录最高统治者——天子——的言和行,即所谓“左史记事”,“右史记言”^②。扩而言之,“言”就是统治者所发布的诏令文告,“事”就是以天子的活动为中心的国家每年的历史实录。因为当时散文所应用的范围,主要是颁布政令和撰写历史——记言或记事。

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最完整的散文著作是《尚书》。它的内容是由西周史官保存下来的最高统治者的诏令文告之类,都是“记言”的散文,其中一部分应该是殷代的文献^③。很多还活到今天的富于形象性的比喻,如“洞若观火”、“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以及我们常说的“星火燎原”、“牝鸡司晨”等成语,都是从古老的《尚书》中流传下来的。这些政治性的文件在文章的表现技巧方面已有一定成就。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那些至尊无上的奴隶主作威作福的神态,体察到他们对臣民的斥责、命令、恩威并施等居高临下的口吻。这说明当时史官已经有了足够的驾驭文字的能力。但这部“记言”的散文著作距离今天实在太遥远了,语言文字上有着较多的困难和障碍,它在散文方面的影响已在逐渐消失。至于最高的“记事”的史籍,只有东周时代的鲁史《春秋》还保留到今天。

代序 / DAXU



二

从西周以来,广大的奴隶和平民即已对贵族奴隶主进行了不断的反抗和斗争。东周以后,作为最高奴隶主的周天子,在奴隶的反抗和外患的侵逼之下,逐渐失去了统治权。所谓“王室”,已是日益衰微,有名无实了。到了公元前722年以后,进入“春秋”时代^④,亦即所谓“王纲解纽”的时代,社会上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新兴的封建贵族(如郑国)和旧有的奴隶主贵族(周天子)之间开始展开了斗争。从这以后,原来作为王室屏藩的各国诸侯,这时都纷纷自成局面,不向奴隶主周天子称臣纳贡,有的诸侯甚至根本不承认周天子的政权。而在各个诸侯国家内部,许多专揽政权的大夫也在他们所应享有的“公田”以外开辟了大量的荒地,成为“私田”,不向国家纳税。等到私田日益增多,数量超过公田,原来的奴隶制度就无法维持,而为封建制度所代替了。因为这些诸侯及其大夫们在增辟土地的过程中,由于奴隶们的不断斗争,作为剥削者的诸侯和大夫,就不得不被迫改变原来的剥削方式,形成了新的地主和农奴的生产关系。这样一来,大量奴隶的社会地位便有所改变而成为平民;原来在奴隶社会中的许多等级较低的统治阶级上升为新的封建贵族统治者,而原来的贵族奴隶主却不得不纡尊降贵,急剧地垮下来,改变了身分。因此,原本只垄断在奴隶主贵族统治者手里的文化学术,到了春秋末年,便开始转移,主要由属于“士”这一阶层的人们所掌握了。(“士”这一阶层成分很复杂。有的是属于封建新贵族统治阶级的中下

层,有的则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各国诸侯既俨然以天子的威权行使于其本国之中,那么周天子所有的一套排场,诸侯也都要享有;甚至连大夫一级的统治者也按天子的派头行事。他们行天子之礼,奏天子之乐,同时,当然也就有了自己的“史”——上述的鲁史《春秋》,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据《孟子·滕文公下》记载,除《春秋》外,当时的晋国有《乘》,楚国有《杻杙》,都属于“记事”类的史书。只是这些史籍已完全失传了。

《春秋》是用简短的文句写成的历史“大事记”,根本算不上成篇的散文。但据解释《春秋》的《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等书以及历代治《春秋》的学者们的意见,都认为《春秋》在修辞方面很有斟酌,甚至每一个词、每一语法结构也各有其特定意义,不是随便乱用的。这对后世古典散文的写作的确带来较大影响。比如“五石六鹣”的说法就一向为研究修辞学的人们所称引。鲁僖公十六年正月,宋国发生了陨石和鹣鸟倒退着飞行的事件。《春秋》记载这件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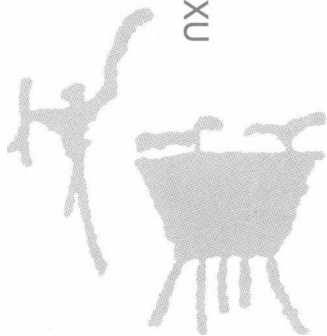
春,王正月(周历正月),戊申(正月里的一天),朔(这一天正是初一),陨石于宋五(在宋国坠落下五块陨星的石头);是月(就在这个月),六鹣退飞过宋都(六只鸟倒退着飞经宋国的都城)。

《公羊传》对这段记载做了解释,大意是说:

为什么先说“陨”,后说“石”,最后说“五”呢?因为这是记述一件诉诸听觉的事。人们首先听到的是砰然坠地的声音;用眼一看,才知是石头;等仔细考察,才知有五块。所以说“陨石于宋五”。为什么先说“六”,

代序 /

DAIXU



后说“鷖”，最后说“退飞”呢？因为这是记述一件诉诸视觉的事。鸟在天上飞，人们首先看到的是鸟的数目有六只；等仔细考察，才知是“鷖”；及至更细地慢慢考察，才发现鸟是在退着飞行。所以说“六鷖退飞”。……

这一修辞事件对后世古典散文写作有一定启发性。但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具有复杂丰富的含义和深微曲折的笔法的字句后面，还包涵着强烈的褒善贬恶、明辨是非的倾向性。当然这种倾向性是打着统治阶级烙印的。后世称这种带有倾向性的史笔为“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的形成是同史官的立场观点密切相关的。前人认为《春秋》一书曾为孔子所修订，这个说法基本可信。而我个人认为，孔子乃是一个努力建立封建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而非奴隶主贵族阶级的顽固拥护者。由于孔子长期在政治上失意，因此他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他毕竟还是牢固地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人，一心希望出现一个新的“大一统”的时代，把当时诸侯割据的分崩离析的局面统一起来。所以他在修订《春秋》时，一方面既要为统治者讳言一些与其阶级利益相矛盾的东西（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另一方面，为了垂戒于将来，使后来的统治者懂得怎样才能更好地巩固政权、治理国家，于是又不甘心把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乱臣贼子”的罪恶完全掩藏起来——这就产生了所谓“春秋笔法”，亦即寓褒贬、抑扬、讥刺于字里行间的写作手法，从而产生了“一字之褒，宠逾华袞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见晋人范宁《春秋穀梁传序》）的效果。我国古典散文传统风格中所具有的含蓄蕴藉、旁敲侧击、匣剑帷灯式的手法特点，以及在对反面人物进行讽刺时往往能做到“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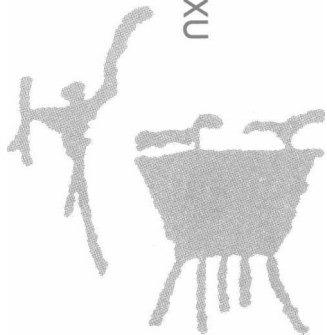
一贬词而情伪毕露”(鲁迅语),就是从“春秋笔法”发展来的。《春秋》的特色及其对后世散文(包括明清文人创作的章回小说)的影响也正在这里。

《春秋》之外,记载周代各国史实的书,还有《左传》和《国语》。这两部书内容比较丰富,也有较高的艺术水平。相传它们都是由一个名叫左丘明的盲史官写成的。《左传》的全称是《春秋左氏传》,据说也像《公羊传》、《穀梁传》一样,是解释《春秋》的书。但从实际内容看,它与《春秋》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最早可能是一部独立的叙事较详尽、文学成分比重很大的历史著作;后来经人改订,才附丽于《春秋》的。它虽然收入大量“记言”性质的史料,但还是以“记事”为主的。《国语》又称《春秋外传》,内容则偏重于“记言”。这两部书内容重复矛盾处很多,可见史料来源不一,不像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大概它们都是由战国时代的人把史料经过搜集、整理,编纂成书的。

《左传》、《国语》都保持并发展了我国叙事散文简明精练的传统,艺术技巧也更加成熟了。特别是《左传》,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经济的笔墨博得历代文学家和史学家的推崇揄扬,认为它是古典叙事散文的模范。归纳起来,《左传》的艺术成就约有三点:一、叙述琐屑庞杂的大事件如大战役、大政变、大盟会等,能提纲挈领,一丝不乱,充分表现出作者安排情节和驾驭文字的才能;二、文章中大量出现了形象化的细节描写,敢于用夸张多变化的艺术手法突出地描写人物或事件,甚至在史实的叙述中采用了虚构的情节(这应该是吸收民间传说的结果);三、在辞令方面,不但写得娓娓动人,而且在以散体句法为基本形式的基础上大量运用工整排偶的文句

代序 /

DAIXU



和精确新颖的词汇，使文章增加了韵味和色彩。但这三个特点又都是在简明凝炼、惜墨如金的情况下形成的，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国语》中的“记言”文章，大都属于诸侯各国君臣之间互相发表的政治见解或诸侯彼此之间的外交辞令，某些篇章写得简洁匀称，而且善用比喻，能如实地表达出发言者的身分和个性。比起《左传》来，《国语》的文笔虽略嫌浑朴质实，但如《周语》、《晋语》、《吴语》、《越语》诸篇，其中不少“妙理玮辞”，确也使人“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明人陶望龄语），是可以同《左传》相媲美的。

三

从公元前 403 年到前 221 年秦代统一以前，史称战国时代。在这一时期里，古典散文有了空前的发展。这当然是受当时社会急剧变化影响的结果。

自春秋时代以来，由于奴隶社会的崩溃，引起了人们思想意识上的显著变化。社会的变革动摇了奴隶主们所最崇敬的上帝的无上威权，而个人的作用则在这时大大被肯定了。文化学术既然由“士”这一阶层的人们掌握，他们就通过授徒讲学和各处游说的方式传播历史文化知识和政治观点。春秋末年，作为儒家学派开山人的孔丘，曾带着门徒周游列国，他的弟子相传有三千人之多。由孔子弟子或他的再传弟子编辑的《论语》一书，是诸子百家著述中最早的一部。它是说理文的萌芽，也是语录体文章的典范，其语言的含蓄精炼是这部书的最大特色。到战国时代，私家讲学的风气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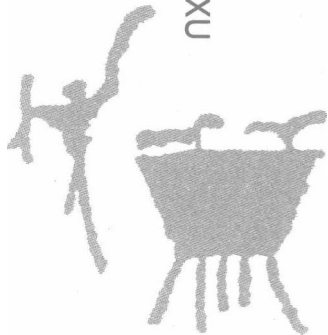
加普遍。当时阶级斗争日益激烈，各国的兼并战争日益频繁，人们谋求统一局面的愿望因而也大为加强。在旧的社会制度崩溃后，一套足以适应新社会的新的政治制度怎样才能建立起来，便成为摆在人们面前最重大的课题。于是许多思想家、政治家一时大为活跃，从他们各自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纷纷讲学著书，奔走游说，希望凭借某一诸侯国统治者的实力来实现他们的理想，施展他们的抱负，从而形成了“处士横议”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家如儒家的孟轲、荀况，墨家的墨翟、宋钲、尹文，道家的庄周，法家的商鞅、韩非，名家的公孙龙、惠施，政治家如兵家的吴起、孙臆，纵横家的苏秦、张仪，都是一时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其中又以孟、庄、荀、韩四家的著作对后世散文的影响较大。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各自运用生动亲切、富有形象性，同时又条贯缜密、富有逻辑性的语言，把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见解到处向人鼓吹宣传，并且著书立说传授给弟子，作为“立身行道”的依据。这些论著就成为我国古典说理散文的丰饶宝藏。

孟轲是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的再传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成为先秦儒家学派第二号权威人物。现存的《孟子》七篇，是孟轲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根据他的言行与学说辑录而成的。

《孟子》书中有不少尖锐泼辣、锋芒毕露的说理散文，雄辩滔滔，富于战斗性。但文章里也有故弄机巧或强词夺理的地方，不免失之主观武断。唐代的韩愈，宋代的苏洵、苏轼，都长于写气势浩瀚、辞理并胜的散文，显然是受了《孟子》的影响。

庄周属于道家学派。现存的《庄子》三十三篇为庄周本人及其后学所

代序 / DAIXU



著,是经过魏晋人整理的。

尽管《庄子》中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应该批判,但《庄子》的散文在艺术方面却具有较多的特色。它的文辞瑰丽而奇警,想像丰富,结构空灵,飘忽无端,出人意表。后世以苏轼的散文作品受《庄子》的影响最为显著,也具有《庄子》文风的特点,这是人们所公认的。

荀况生当战国后期,在儒家学派中属于有创新之见的人物。今传《荀子》三十二篇,大都出自荀况本人的手笔,《荀子》的文章结构谨严,语言整饬,条分缕析,立论周详,对西汉初年的政论文有直接影响。

韩非是荀况的弟子,是战国末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今存《韩非子》五十六篇,大部分为韩非本人所著。《韩非子》的文章态度严峻,文笔犀利,论辩鞭辟入里,有较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又多采用民间传说作为寓言,说理深入浅出。唐代柳宗元的一些杂文和短论,主要是受《韩非子》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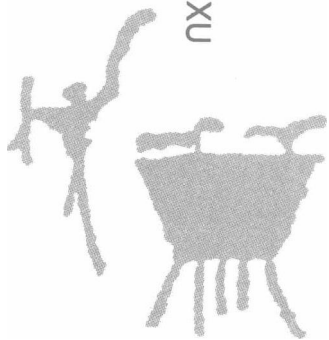
作为先秦诸子说理散文的共同特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文章大都条达流畅,逻辑性强,文笔明快生动,比先秦史籍要浅显易解,接近口语;二、遣词立论不仅有较大的说服力,还有较强的感染力,在严肃的论证和细致的分析中,往往带有逸趣横生的幽默感,使人感到亲切而不引起厌烦;三、一些哲学论文、政治论文甚至军事论文,虽然都是抽象的理论,但作者们善于运用文学手法,用一连串的眼前事物做比喻,驰骋着丰富的想像力,通过生动具体的寓言故事或历史传说,浅显地阐释他们所要发挥的深奥的道理,使读者感到生活气息浓厚和文学气氛强烈,因而易于接受和吸收。这些特点就成为我国古典说理散文的传统风格,对后世散文作家产生了较大

的影响。

秦汉之际,还有一部介于子、史之间的《战国策》。这部书里既有许多游说之士发挥政见的纵横捭阖之辞,又有一些历史上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栩栩如生的人物描写。从文学的角度看,《战国策》可以算作秦汉以来一部比较出色的散文集。其中说理部分与先秦诸子的文章有共同之处,不少篇幅较长的文章都有严密的结构和整齐的文句,一个属于纵横家的人物向某一国的国君游说时,对于这个国家的疆域、出产、民情、政局都有详尽的陈述和分析,间或也加入一些有趣的寓言和传说来晓喻利害、明辨是非。而属于记叙史实的部分,则用比较浅显生动的语言和带有浪漫色彩的细节描述,代替了《左传》、《国语》中那种简古的语言和艰涩的句法。在这方面,《战国策》已成为西汉卓越的史学家兼文学家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前驱了。

先秦的史籍和诸子论著成为我国后世几千年来叙事散文和说理散文的光辉典范。后世叙事散文的简明洗炼,说理散文的流畅条达,都是从先秦散文作品中继承下来的优点和特色。而后世散文所要求的极致乃是寓简练于流畅之中,在条达流畅的基础上力求概括凝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叙事散文中同时有着“记言”的传统,充满了丰富多彩的辞令,使叙事中的对话部分不至陷入枯燥板滞;而在先秦的说理散文中又同时具有浓厚的艺术趣味,充满了活泼多姿的寓言,使读者对于比较深奥抽象的理论部分不至于吃力费解——这种兼容并包的风格上的多样化,就更成为后世散文作家所学习的榜样。

代序 / DAI XU



四

西汉初年,散文作家如贾谊、晁错等人所写的说理文,大体遵循先秦诸子遗意,具有素朴流畅的风格。但文辞已渐趋工整对仗,开始往骈俪的倾向发展了。

西汉中叶,在汉武帝刘彻时,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尽其毕生之力写了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通贯古今的史学巨著《史记》,给古典散文史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除了十表、八书和一篇《自序》之外,司马迁写了一百多篇历史人物的传记。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传文学,在我国是从司马迁创始的。他根据历史上的真人真事,用他那与统治阶级观点不无牴牾矛盾的褒贬尺度,施展他纯熟而卓越的文学技巧,运用写实和夸张相结合的创作手法,通过对历史素材的剪裁和集中,把很多历史人物塑造得更具有典型意义。在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不仅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也是各个实有人物的理想化身。他把这些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通过文学手法强烈地刻画出来,使他们具有鲜明突出的可爱或可憎的色彩和比较典型的政治意义。他在各篇传记的叙述中,不仅注意到巨大的生活场景,也注意到微末的生活细节;不仅把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个性化,也把历史上的真实事件戏剧化。他善于融会古籍,善于采纳民间的传闻轶事,善于从人民口头汲取活的资料,因此《史记》的语言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既深入浅出又丰富多彩,具